

邱克威 (Kiak Uei KHOO)\*

## 二战前“国语运动”在新马社会的开展与普及

###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Guoyu Movement in Pre-war Singapore and Malaysia

**摘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语从形成之初就具有极大的共性，这是历史与社会因素使然。虽然两地华人社会从方言转向华语的发展途径或许略有不同，但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发展则基本属于一个共同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20 世纪初中国国语运动对于两地华语的形成与普及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一点虽然已有不少学者提出来，但至今却未对国语运动在新马华语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开展的过程进行梳理。本文通过 20 世纪初期的报章记录以及当时侨务机关的各种调查与研究报告，分析二战以前新马社会国语运动的发展过程，并根据发展态势与活动特征，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1912-1918 年的“萌芽期”；二、1919-1928 年的“发展期”；三、1929-1941 年的“全盛期”。

**关键词：**新加坡华语； 马来西亚华语； 国语运动

**Abstract:** Due to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factors, there existed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n and Singaporean Mandarin. Though Mandarins in both Chinese communities ended with a slightly different path of development, they could be considered a common entity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with the influence of Guoyu Movement since the early part of the century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n factor. This has been raised by different scholars, but till date no study was done on its exact influences and its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ased mainly on newspaper articles and study reports from that period, divided the Guoyu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to three stages: 1. Sprouting Period between 1912-1918; 2. Development Period between 1919-1928; 3. Prime Period between 1929-1941.

**Keywords:** Singaporean Mandarin; Malaysian Mandarin; Guoyu Movement

## 1 绪论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的华语近一百余年发展中的多数时段里都具有极大共性，只是在近数十年间开始各自发展，形成目前略有差异的华语变体（参看邱克威 2012）；其早期共性的最主要因素就是 20 世纪初国语运动在新马两地的开展。

目前关于马来西亚华语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期，虽未有细致而系统的分析论述，但还是有不少人进行过笼统的概括。其中较重要的是徐威雄（2013），其云：

---

\* 邱克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雪邦，雪兰莪 43900，马来西亚，E-mail: KiakUei.Khoo@xmu.edu.my

华族共同语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从清末“官话”到民初“国语”，可以 1919 年为断限；第二是国语教育的普及阶段，一直到二战前后；第二则是战后至独立时期的“华语”转变与发展。

此外还有如潘碧丝（2007）所分的四个阶段：19 世纪末的文言文阶段；20 世纪初的白话文阶段；1966 年至 1982 年向台湾趋同时期；1982 年至今向普通话趋同时期。另如徐祎（2017）分的四个阶段：华语方言期（18 世纪末-19 世纪末）；通用华语的萌芽期（19 世纪末-1919 年）；通用华语的成长期（1919-1941 年）；通用华语的成熟期（1947 年-今）。

邱克威（2017）从华语性质与形成的角度，整体提出：

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是近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直接产物；马来西亚华语并非纯粹是普通话的海外变体。从其形成历史及形成途径来说：一、与整体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同步展开的，二、形成环境与内部构成都具有独立性。就其与主流共同语的互动来看，其中有三波重要的影响时期：第一是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第二是 1970 年代以来的台湾华语影响；第三是 21 世纪伊始的大陆普通话影响。

以上均属于比较宏观的分期，而这些宏观视角所得出的分期也都大体一致，尤其都强调民国初年“国语运动”对早期华语形成的重要作用。对此，邱克威（2014）曾以当时《叻报》语料为例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并从“巡差、扫文”替换为“警察、肥皂”等的具体词汇现象指出：“通过对《叻报》词语的考察，方言词汇与官话/国语词汇的交替也主要体现在 1920 年代。”同时也印证了徐威雄（2013）提出“1919 年为断限”的结论，云：

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对新马华人词汇由方言到华语的转换影响是很关键的。这一冲击波经过发酵渐渐在 1920 年代的《叻报》词语显现出来。这一点，相信在深入挖掘《叻报》词汇特点之后应该能勾勒出一个更完整的动态画面。

实则谈及新马华语的形成与国语运动的影响，我们必须了解 19 世纪以至 20 世纪之交的新马华人社会语言概况。首先其口语层面自然是以方言为主，这已经多人指出，如 1889 年李瑞清《条陈扶植华侨学务扩充招待侨民学堂文》称：“见我国侨居习惯，语言必须通英、巫来由、广、潮、福各种，而官音乃视同格磔”（参看徐威雄 2013、邱克威 2014）。其实同等重要的是书面语情况，举例如 1915 年《振南日报》的一则广告：

嚟弄树杞园广告：柔佛西奕于吗嚟弄馆，住直街门牌一百零八号。奉大咯之命，定于英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利心末一十九号，下午三点半钟，欲发嚟弄黄亚炎之椰园一丘，在龟来路，阔一百二十四怡葛，呀嚟三百一十号；并灰屋三间：计怡不勝啖街二间，呀嚟九百九十九年，列一十八号、三十八号；计一间在纱玉街，呀嚟九百九十九年，列三号。事缘欠广益银行之项，无还，故将该业发嚟。诸君合意，届期可到本馆打买。如受买者银项等情，依照旧例施行便是。特此布闻。（振南日报 1915d）

这种早期白话“半文言”且参杂方言与外语式的文体，正是新马华人社会直到 20 世纪初普遍通行的社会书面语形式，不论是当时报章、公函、通告、社团文献记录等均是如此。比如上引文中“嚟弄”即马来语 lelong 的闽南语音译，意思是“拍卖”；“怡葛”、“呀嚟”分别为英语 acre、grant 的闽南语音译，意为“英亩”、“地契”；“树杞”、“大咯”、“阔”、“打买”则均是闽南语词汇，前者指橡胶，其次“大咯”指警长，又作“大狗”，再次“阔”指的是“宽度”，后者则是闽南语“购买”的意思。

由上述早期白话夹杂方言与外语式的文体转变为当下标准白话文的书面语体，其实正是 20 世纪上半叶“国语运动”的其中一项重要成果。然而目前为止，仍未有人对数十年“国语运动”在

新马华语形成过程中的具体开展情况做过历史的梳理。实则经过本文的具体分析，所谓“官话”到“国语”的发展以1919年为界限，仅仅只是“国语运动”开展过程中的一个铺垫阶段，即这一时期“国语运动”开始形成较大的发展，而且主要是以知识界、文化界为主体响应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映；只有到了1929年以后，尤其1930年代初期“国语”才开始在社会各领域比较普及化，“国语运动”才真正达到全盛期。

本文正是通过二战以前新马社会宣传与推广“国语运动”的历史过程，主要以当时的报章报道与中国侨务机关调查报告为材料，梳理华语在新马华人社会中逐渐成为通行用语的发展阶段。

## 2 新马开展“国语运动”的三个历史阶段

根据历史材料的梳理，本文将国语运动在新马战前的开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期”，即1912-1918年

第二阶段为“发展期”，即1919-1928年

第三阶段为“全盛期”，即1929-1941年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其主要影响因素仍是以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形势为主轴，包括当时中国侨务机关对于南洋华文学校的相关决策；因此新马地区开展国语运动的三个阶段是与中国国内国语运动的发展有较大呼应性的（参看黎锦熙1921、1935[2011]）。

首先，国语运动自1912年在中国国内推行，至晚于1912年12月在新马就出现了一份“国语夜学”的招生广告；因此其开展几乎也是同步的。这时期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总领事馆及其主持的“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第二阶段始于1919年则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作用，这时新马文化界较积极响应，包括学校也普遍开始重视国语课；但谈及触及社会各阶层以及学校教学用语，则远远未达到预期效果。至于以1929年为第三阶段的起始，则是这一年中国侨务委员会颁布《关于华校采用国语教授》通告，并由当时总领事唐榴登报重申（叻报1929c），由此展开一系列针对学校与民间的国语推广活动。这时起才算是新马华人社会各阶层积极投入国语事业。分析其原因，则1927年国民军北伐确立南京政权，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旗帜下的“民族统一”与“语言统一”宣传是极重要的因素；尤其1928年成立侨务委员会后出台一系列与南洋华校教育与管理相关的措施，在社会上民族主义思想引领与学校内国语政策贯彻的双管齐下作用下，新马国语运动进入了全盛期。

此外得特别强调，上述三阶段分期与1936年《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有关中国侨务机关对南洋华文学校管理制度上的历史发展分期有较程度的契合；其民国后大致分为三期：一、“自领事兼管华侨教育之规程公布后”；二、“自民国八年以后”；三、“迨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林之光、朱化雨1936：35-37）。可见新马国语运动的发展阶段分期与华文学校教育的发展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至于1930年代后期，自从1937年新马华人积极支援中国抗日活动，民族主义思想极度高涨，团结与统一口号横飞，各方言帮群之间的界限趋于淡化，这时期的“国语运动”持续发展。尤其战后初期抗战胜利带来的民族情绪继续升温，这时期的华文学校几乎已经全部实行国语教学；就如1949年新加坡光华学校校长陈宗岳对当时华文学校发展的概括：

马华教育，除三分一马华人口属侨生的大多数受英语教育之外，其余三分二中国生的历来自办私塾或学校，在私塾时期向不为外人所注意。入民国以来，侨教受辛亥革命

的影响，忽呈蓬勃气象，三十余年以来，侨教乃无异于祖国教育的变相，不特国语变为侨校唯一的教学中介，即整个课程亦遵照祖国的编制，略加损益，未适应当地的环境。（南洋商报 1949）

反观 1915 年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对当时新马华校方言帮群畛域严明的批评，其云：“盖南洋各埠之学校，多为福潮客广琼等帮人所创设。甲帮之学校，往往不收乙帮之学生，丙帮之生徒，往往不能进丁帮之学校”（振南日报 1915a），如此则更能体会 1949 年“国语变为侨校唯一的教学中介”的成果，确实是得之不易的。

以下分述各阶段的国语运动发展情况：

## 2.1 第一阶段为“萌芽期”，即 1912-1918 年

第一阶段的国语运动主要是在华文学校内展开，这时期的运动基本由总领事馆主持的“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在推动。

如上所述，新马地区至晚于 1912 年年底就出现一所国语夜学。1912 年 12 月《叻报》上有一则《爱同学校招生夜习国语广告》，云：

公启者，语言统一之关系，人人知之，而于我五大民族四百兆人之崭新中华民国为尤重。……同人等有鉴于此，故组织本校之初，早已函致北京专聘张水生先生南来教授国语。现在张先生经已抵坡，同人等特在校中先办夜学教授国语，及英文算学等科。除礼拜外，每夜由七点钟起授至九点钟。我侨胞有欲就学者，请早到校报名可也。  
（叻报 1912）

新加坡爱同学校由福建会馆创办于 1912 年，其云“组织本校之初”就已筹划国语班；而且这所国语夜学是面向全社会，而非仅是爱同学生。我们无从得知爱同国语夜学的办学效果，其后华人社会仍有零星一些国语夜学或国语讲习所出现，只是这时期并未真正普及。这时期较具规模的国语班应属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于 1915 年开办的二所国语讲习所，“合计学生九十名”。按其原定计划，学务总会本是相当乐观的，计划分设三处国语讲习所，各所学额“以六十人为限，无分畛域”，学制则“以六个月为限”，“教法以通常日用，白话授之，或用口授式，或用问答式，或用谈话式，俾学者易于领悟”（振南日报 1915b）；但最终仅设二所，合计学生人数也远未达到预期。

上文提过，这时期新马国语运动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这个学务总会由 1912 年开始筹办，1914 年正式开幕，其发起人时任总领事胡惟贤开幕词云：

学务总会何为而设也。初非以南洋英属之学堂林立，势如散沙，各自为学，人自为师，而有所不满于中也。良以中学之造诣，既邃且密，西学之程度，既高且深，居今之世，为今之学，必欲精益求精。于是慎之又慎，乃设斯会以统一之、以研究之。（振南日报 1914b）

此外，1913 年中国教育部颁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章》，规定总领事馆监管在地华文学校，条例云：“一、对于各华侨学校宣达教育部法令；二、对于华侨学务上之纷争调停或处理之；三、遇必要之时得向各学校表示意见，指导改良。”（檳城新报 1914）

因此总领事及其操办下的学务总会本来就有宣达教育政策、监督学校的职能，“国语”政策自然是其份内职责。只是上文提及国语讲习所招生不如预期，乃至这一阶段内的“国语运动”

开展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除了新马华人社会方言畛域观念仍很深固，还有就是学务总会缺乏推动社会运动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参看邱克威 2019a）

此外还应注意，民国初年中国教育部对学校教授“国文”、“国语”二门课的性质认识较为模糊，重在识字扫盲以达教育普及；于是 1915 年学务总会公布的工作细则云：“各国普通教育，皆以文字为必须科，教育家亦以国文一门列于基本科目之内。”（振南日报 1915a）

而根据当时整体学校授课的惯例，国文、国语分为二门课，且普遍偏重国文；其大致区分为国文课实际上类似于蒙学尺牍、古文，而国语则是白话文，偏重发音与对话。比如材料上所见，1914 年新加坡养正学校课程内写明：“国文（注重书札）；国语”（振南日报 1914a），而同年新加坡端蒙学校考试题目云：“国文题：晋破苻秦于淝论”、“国语题：论国语之关系”（振南日报 1914c）。南洋华文学校偏重国文课的现象，甚至 1922 年中国教育部已规定小学国文课全改为“国语”之后仍然较大程度的持续；而是直到 1930 年代，学校才普遍将小学国语的每周授课时间增至高于国文课之上（参看林之光、朱化雨 1936: 163、211）。

至于国语课，整体上侧重于发音、对话，以及作文；当然是前二者为重中之重，即所谓“言语教授”，如 1921 年对其内容的总结云：

就国语教育底范围说来，有言语教授、有文字教授、有语法、有缀法。其中最为根本的教授，是什么呢？不用说，自然是言语教授了。再把言语教授细分起来，有两个方面：

（1）就是发音教授、音调教授、讹音矫正；（2）就是言语内容底教授。（太玄 1921）

至于新马华文学校，则直到 1930 年为止的国语课均普遍较少侧重作文，即白话文写作；如 1936 年《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中对于 1931 年为止各种调查报告的总结云：“国语作法及写法多被忽略”（林之光、朱化雨 1936: 184）。

这时期还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福建会馆作为较早响应推动国语教育的单位，其影响是较显著的。比如上述爱同学校创办之初就延聘国语老师，并开设国语夜学。实则同属福建会馆管理的道南学校堪称当时新马两地最大型、最优秀的学校，同时也是最早实行国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如其 1907 年招生广告上仍直书“所教初班国文概用漳泉土音”，又其招聘教员也说“教员专操漳泉土音以课初班学生”（叻报 1907a、1907b），但很快 1912 年后就开始尝试打破方言群界限，并且“带头收各籍学生”（王振春 1990），又于 1917 年聘非闽籍熊尚父为校长，1919 年实行“普通话教学”（参看董立功 2015）。

同时期内福建会馆属下的爱同学校也同样对“国语教授”已深具意识，并相应做出了改变；比如 1915 年的学校“大改良”中“第三条”列明：

现时本坡各校之教员，或用海南语，或用闽语，或用客语，虽各有其不得已之故，然语言庞杂，大非所宜。增长地方界限，害一；阻碍文化之进步，害二；减少一国之团结力，害三。明达之士，当引以为大患。本校虽为事实有限，未能一体遽用普通语教授，然拟每日随时授普通语十数句，逐渐递进，历时六月，必有可成。（振南日报 1915c）

甚至是 1930 年开始，新加坡福建会馆通过内部改组更提出合并管理属下三校，乃至提出了各帮派学校合并管理的目标（南洋商报 1930b）；这就要求不仅教学用语统一，连行政用语也都统一使用国语。至少在 1935 年会馆教育科就已成功举办了“三校联合会考”（南洋商报 1935）。

当然，除了爱同与道南，这时期还有一些受民国初新式教育与国语运动感召的学校，包括由原私塾改建成新式学堂的，而且未局限于方言畛域，其办学之初就注重国语教授。比如创办于 1912 年的麻坡中华学校，当地闽南人和潮州人为主体的，但第一任校长饶艺农则是客家人，根据 1962 年的记载云：

课本采用新教科书，以华语教授，于 1912 年 4 月 1 日开学。饶校长受新思潮洗礼，因此，师生制服采用军服军帽。（转引自郑昭贤 2012：261）

又如新山宽柔学校也同样是创办之初的 1913 年就“采用国语教学”（陈宝锦 1970）。

## 2.2 第二阶段为“发展期”，即 1919-1928 年

1919 年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的影响所及，中国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授国语令》，其云：

现在全国教育舆论趋向，又咸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主。……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国语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转引自朱麟公 1921：3-4）

嗣后又于 1922 年规定小学全年级都改为“国语”。

这当然在本地学校起到一定影响，但显然例外仍是不少，甚至到了 1935 年的《考察南洋华侨教育意见书》中，仍看见记述吉隆坡州立学校与檳城钟灵学校课程时均称：“课程注重国文”；乃至记录了一些“课程与部定标准不符”的情况（黄麒书 1925：17、20、23）。又 1936 年《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中也列表指出 1929 年英属南洋地区调查的 61 所华文学校中仍有 14 所开设“国文”课程（林之光、朱化雨 1936：162-166）。

延续第一阶段的发展，这时期国语夜学、国语讲习所更是大量开设，尤其“改授国语令”对于一般夜学班、补习班也起着一定影响，比如 1921 年马六甲夜学的通告云：

民国九年教育部令，又把国民学校的国文改为国语。为什么不要国文呢？难道把我们几千年的国粹废掉去吗？不是的。因为国文的文法很深，读得书少的人，不独不会做，而且不会看，不如国语浅显明白，口里说出来就是言语，笔下写出来就是文字，岂不是文言一致了吗？……本校是通俗学校，专为年长失学者补习的地方，更应提倡国语。故去年除普通班外，办有国语专修科一班，来学的人，一天一天加多，故是于今年增设国语专修科一班，仍由何大愚先生教授。（新国民日报 1921）

又如吉隆坡中国青年益赛会这时期也开办国语夜学，“每晚试验注音若干字，每拜晚轮流演讲，纯用国语，以资练习”（南洋商报 1923）。另如麻坡华侨国民夜学在 1925 年就有“国语教员一位，系张维君担任，……国语班有七十余人”（新国民日报 1925）。此外，乃至一些较小市镇也积极开办国语班，如 1919 年《新国民日报》一则报道云：

邦咯小埠，地属奇甸，吾侨居此者亦不多，惟鉴吾人之交际，同是国人，因言语互异，致彼此畛域，……爰集该埠诸热心家商议，现筹有基金，创设鼎新国语讲习所培养青年子弟，以备中年失学者，统一言语，务使声气相通。……（新国民日报 1919a）

当然就如中国教育部公文里提的“现在全国教育舆论趋向”，因此本文开篇也强调新文化运动对新马地区开展国语运动的社会影响，只是这一阶段推动国语运动发展的因素，还是有赖于其他条件的。正如黎锦熙 1921 年所总结的“过去之重要事件有四”：读音统一会之议决音标、国语研究会之鼓吹改革、颁布注音符号、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黎锦熙 1921）。

当中尤其注音符号的公布，上文提过国语课教授内容侧重于发音，乃至这时期起国语课以外还普遍开设“国音”课程（参看林之光、朱化雨 1936：211）。尤其是 1920 年代颁布“新国音”与“国语罗马字”作为注音第二式，1928 年在新加坡就开办了一所“国语罗马字传习所”（南洋商报 1928）。

虽然徐威雄（2013）、邱克威（2014）都曾提出 1919 年是新马国语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分界点，比如《叻报》词语从这时起发生了较大变化。但需要辨析的是 20 世纪初新马华人社会的报章仅属于少部分文化人的读物，以《叻报》为例：创办的 1881 年仅日均发售 50 份，两年后稍增至 350 份，到 1894 年也仅达到日均 450 份（陈蒙鹤 1967[2009]：38-39）。

因此《叻报》的词语变化只能是代表当时新马文化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而非华人社会的普遍现象；就以学校为例，当时教学或行政用语仍主要是方言，如 1920 年居銮华侨学校招聘教员，虽提出用“国语教授”，但同时还须“兼闽粤语者为合格”（新国民日报 1920）。

此外，即使这时期的《叻报》也仍是继续使用一些方言土语，包括上文提及的“扫文”、“巡差”等，直至 1928 年也难免如此，如当年报道云：“乘风车往武吉智马参观华侨中学”（《叻报》1928），其中“风车”意为汽车，即闽南方言词。又如同时期《叻报》1925-1926 年所连载的《南洋商场习惯语》，当中多为方言与英巫语借词，如“君得力”释义“英语 contract 之译音”、“亚金”即“巫语 Hakim 译音”等，尤其多方言词，如“食风”解释云：“闽语，意即出游息于山间海滨，山水优胜之域，以资调养也。”（参看邱克威 2017）可见这时期社会大众仍通行这些方言或方言所译外语词汇。

当然，不得不提出经过文化界的推动，这一阶段的后期还是展现出国语运动的一些佳绩，尤其是学校内的变化较为突出。其中一种表现就是 1926 年 5 月份开始各地学校在《新国民日报》上连载的学生白话文艺版，据统计直至 1928 年为止的种类达到近 40 种。当然从 1929 年起更是如雨后春笋，截至 1933 年 4 月份《新国民日报》停刊又另新增 40 余种。这个累计总数 80 余种的文艺版，几乎全都是学生创作的白话文作品，而且以小学生为主。由此可见各地学校与学生对于白话文书写的积极投入及其总成果。其中最早的当然是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晨星》，此外属于这个阶段内的还有麻坡中华学校《新月》、吉隆坡《青年之友》、关丹林明中华学校《林明》、实兆远国民学校《新芽》等（参看邱克威 2019b）。

此外还不得不提，《新国民日报》自 1919 年 10 月复刊后就堪称是当时白话文的主力，其报道多用白话文，形成同时期《叻报》与《振南日报》等的极大对比。如其复刊之第一期“例言”谈及《新国民日报》的办报“大纲”，其“第三桩”云：

志愿要改良社会，鼓吹教育，提倡实业，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引诱吾们侨胞，使得人人脑筋里印着极大的爱情。这爱情是什么，便是“中华民国”四个字。（新国民日报 1919b）

其中“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就昭示着《新国民日报》是倾向使用白话文，而事实也是其报内《社论》、《时评》等栏目，基本都是用白话文。尤其是复刊就开辟的《新国民杂志》，更是新马白话文学，乃至南洋文艺的最早重要园地之一（参看邱克威 2019b）；其强调白话的主张，上述“例言”谈及《新国民杂志》的宗旨时即云：

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若满口之乎者也，说着经书上的话头，孔孟的道理，只讨好了旧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赞成了。……因为国家已在实在危险的地位了，所以要讲爱国，将这两个字来唤起民心，故对于下等社会，比上等社会更为注意。因此这些滑稽科诨，浅显的说话，更发少不来。便是本篇用着白话，也就是这个意思了。（新国民日报 1919c）

这里的字里行间即明显可见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想，即其“例言”宗旨所云：“要使得我们侨界同胞，人人趋于进化的方向。”（新国民日报 1919b）

正是学生开始较为积极响应国语运动，这时期有些学校甚至形成了纯国语的校园环境，就如 1920 年代在新加坡任教的张国基谈及道南学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三所学校的印象时提到：

“若不出校，简直不知道是在国外”（参看鲁虎 2014：39-40）。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他所谈及这三所学校的特殊性：一来道南学校从 1910 年代就积极响应国语教学，这在上文已有论述；二来南洋的中学由倡议之初就强调国语教学，其中扩大各籍贯生源是一大考量，因此邱克威（2019a）谈及创办南洋华侨中学在南洋华人教育史上的标志意义时提出：

它不仅是各方言帮群合力办学的成功典范，更是南洋华文学校舍弃方言而朝向“国语”教学的重要里程碑。

### 2.3 第三阶段为“全盛期”，即 1929-1941 年

1929 年开始进入新马国语运动开展的全盛期。这一阶段划分的起始点是以总领事唐榴 1929 年登报重申一份中国侨务委员会通告《关于华校采用国语教授》，其中提及：

国语教授，国内已尽量推行，南洋华侨学校，亦有采用之者，惟据调查所得，尚属少数。如广东福建各省所办之侨校，每藉口于学童不解国音，仍以土语教授，甚且采用巫语，不一而定。（叻报 1929c）

在此前后配合这一条例还有一系列措施，比如 1928 年华侨教育改归侨务委员会管理，以使管理与制度更具针对性，但同时还是兼受教育部条例制约。而侨务委员会就于同年颁布《侨民教育实施纲要》，包括“征集侨校教材，编订侨校适用教科书”、“变通侨校适用课程标准，及训育标准”；且同年又颁布《华侨学校立案条例》、《华侨小学暂行条例》，其中后者规定“华侨小学之教授科目如左：三民主义、公民、国语、外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自然、乐歌、体育、党童子军、图画、手工。”（林之光、朱化雨 1936：62-120）

嗣后 1929 年，侨务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第六次大会”上，提出课程规定：“侨民中小学除外国语一律以国语为教授用语，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林之光、朱化雨 1936：62-120）这就是上述通告的来源。

于是配合“华校采用国语教学”的决策，同时还伴随着南洋华文学校国语教材的本土化；而至晚于 1932 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就相继出版了《南洋国语教科书》、《南洋华侨小学课本》等，都是针对南洋华校编定的国语教材（参看张人凤 2014）。

在新马社会，1929 年“采用国语”决策还是有些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比如当年年终福建会馆属下道南、爱同、崇福三校就联合发招聘校长广告，且声明：“愿受聘者须国语纯熟”（叻报 1929e）。正如上文所提，1929 年开始福建会馆教育科在推广国语教学工作上做出了重大努力，比如鲁虎（2014：39-40）所总结的：

1929 年 3 月，林庆年出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他是活跃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背景很好。他主张以国语作为华侨学校的教学媒介，上任后即规定爱同、道南、崇福三校实行国语教学，接着又把该政策扩展到福建会馆津贴的其他 36 间学校。其他会馆的方言学校也纷纷仿效。因此，30 年代新马的华校基本实行了国语教学，其步伐远远快于中国的学校。

此外，同时期新马各地学校也有积极响应“采用国语”指令的，如 1930 年 1 月初新加坡某学校的教员招聘广告也声明：“能以国语教授”（叻报 1930a），及同年 6 月彭亨文冬启文学校招聘教员广告云：“高初级各学科之教员一位，教授用普通话”（叻报 1930f），又 1931 年彭亨北根中小学招聘教员云：“须有高中及师范以上毕业，国音纯正”（叻报 1931）。如此特别强调国语



能力的教职员招聘启事是前此时期均所未见的。于是延至 1936 年《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云：（林之光、朱化雨 1936：185-234）

国语一门，虽未能完全普通，然较昔日已有显著普通之推行，固无可疑义。

小学及幼稚园的课程，最注重的为国语，每周授课时间，多数在六小时，但亦竟有每周上至三三小时者。

此外，1935 年《考察南洋华侨教育意见书》中记录槟城时中学校的课程表内也列明只有国语课，而无国文；而且如其考察霹雳州公立女子学校，亦云：“教学用国语”（黄麒书 1935：19、21）。

这时期新马学校甚至还有自己编定的国语教材，举例如 1933 年霹雳州打巴（Tapah）公立华侨学校校长王汇东亲自编定的《系曲国语读本》（新国民日报 1933），其卷头云：

国语系文艺之一科，文艺系艺术之一种，故国语科近时盛倡须导学生表演，以增兴趣，而免单调。但单靠对话表演亦不免乏趣，故须系以曲谱，使之随唱随演，自必格外收效——本书之编，正即为此。

这里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当年所谓教材本土化，非仅仅是内容本土化，还包括教授法的本土适应问题，即“盛倡须导学生表演”的教学特征；当然还让我们一窥当时教育界对国语课性质的认识，即“国语系文艺之一科，文艺系艺术之一种”云云。

这其实也基本符合上述关于国语课程内容范围的界定，即发音、对话、作文，只是做了更进一步的诠释而已。实则所谓“文艺之一科”的理解，或许也跟此前调查报告的批评有关，即根据上述 1936 年《调查研究》的总结，1925-1930 年调查的结果显示：“国语之作法及写法多被忽略”（林之光、朱化雨 1936：184）。

这一阶段内学校国语教育对于作文法的重视，正如上文所提及，1929 年以后《新国民日报》上的学生白话文艺版大幅增加，其最盛期即 1931 年更是同时连载 42 种；更重要的是，1929 年 6 月份开始《叻报》的文艺副刊“椰林”进行改革，聘请陈炼青为主编，从此成为新马白话文学的重要阵地（参看邱克威 2019b）。这份“椰林”改革创刊号《编者第一次的献词》（叻报 1929a）算是开宗明义为白话文学立宗，其虽说“不能纯粹一律以白话文为标准”，即不便完全排除“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春风秋月派的诗词，以及且乎然则派的断片零星”的古文，但毕竟终究还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由此亦可显见，这一阶段不仅国语运动进入全盛期，同时也标志着新马白话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参看杨松年 2001：33-84）。

新马国语运动自 1929 年始进入“全盛期”，其关键因素还不在于当时的华文学校，而在于配合更广大社会大众所开展的一系列推广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专门的“国语学校”，以及定期的“国语演说竞赛”，乃至极盛时期还有专设的“国语周”，等等。

首先，1929 年开始就不停有中国国语专家南来宣传并授课，第一位是卓剑舟，报道云：

国语专家卓剑舟氏，此次南来，负有宣传国语教育之使命，业于月之一日，抵叻埠，寓南安会馆。闻卓氏近集合本埠爱同学校校长陈文登氏，开办中华国语讲习所，假该校为教授所。（南洋商报 1929a）

这位卓剑舟抵新后的国语宣传活动及其效果基本未见报道，因为堪称是新马国语运动全盛期核心人物的柯达文于同年十月就抵达新加坡了。

柯达文为上海的中华国语统一运动会海外部主任，1929 年 10 月南来一直待到 1933 年左右，这时期是新马国语运动的最高峰时期，而这时段内的所有主要活动几乎都直接或间接由其开展（参看叻报 1929d）。首先 1929 年 12 月他就倡办“中华国语学校”，并于 1930 年 1 月初开学，

由其担任校长（叻报 1930c）；至 1930 年 4 月就取得“学生已达一百三十余名之多”的佳绩。同年 8 月份，柯达文又另创建“中国国语学校”，并担任校长（南洋商报 1930d）。

1930 年的这段时间内，由柯达文发起，并征得总领事馆、25 所学校、5 家报社的支持，“中华国语统一促进会”在新加坡创办。其办会宗旨云：（南洋商报 1930c）

目的就在唤起侨胞，共同努力于国语统一的运动，同时促国语教育于南洋群岛，使得侨胞感情融洽，精神团结，思想一致，信仰集中。

统一的国家，首要有统一的精神，统一的精神，在于人民思想感情的沟通和团结，实在于有统一的语言。

而且同年配合中国本土的“国语周”，新加坡在 4 月份也组织起“国语运动宣传周”，定期为 4 月 14-20 日，倡议各学校各自开展“国语宣传大会”相关活动（叻报 1930d）。且不论这一周内各学校的积极响应，仅是“国语周”之后因原来未及参与而补办的宣传大会，简略统计至五月下旬就有：4 月 25 日培道学校（南洋商报 1930e）、4 月 26 日静方女校、4 月 27 日道南学校、5 月 10 日公立知行义学、5 月 24 日新加坡华侨国语学校、5 月 25 日公立侨星平民学校（南洋商报 1930f）。

可见当时运动的热烈，即使隔年的 1931 年仍是叫人记忆犹新，当时记述云：

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本埠曾举行一个国语宣传大会，那时负责提倡者是柯君达文，侨胞对于国语的重要，好似认为应当刻不容缓的提倡，所以当时国语学校的创设真有如风起云涌，东有一间，西亦有一所，其中规模最为完善者，可推中华国语学校、华侨国语学校，及中国国语学校。每校就学的学生，亦甚踊跃，土生华侨以及工人商人均有。（南洋商报 1931a）

大约 1932 年开始，柯达文就在新马各地奔走演说宣传国语运动，其所到之处包括吉隆坡、怡保、檳城、麻坡、马六甲等地，以推动当地的“华侨国语运动”；此外更于 1933 年在檳城发起组织“华侨国语运动筹备委员会”（南洋商报 1933a）。

其次关于国语学校。首先延续此前阶段的发展，各地国语班更为积极筹办，比如 1929 年起开设的略计有：新加坡“国语夜学院”（南洋商报 1936a）、新加坡青年励志社“国语夜学组”（南洋商报 1932b）、新加坡生命堂“国语夜学”（南洋商报 1932a）、峇株巴辖“国语夜学”（南洋商报 1929c）、檳城“国语专科夜学”（南洋商报 1930a）、雪兰莪“中华国语夜学校”（南洋商报 1933b）、吉隆坡“精武国语班”（南洋商报 1934a）、马六甲晨钟励志社“义务国语夜学”（南洋商报 1934c）、文德甲中华学校“国语夜学班”（南洋商报 1934d），等等。

同一时间段内开设国语班的数量之多，以及国语班所覆盖地理分布之广，这时期应该都是空前绝后的。而且这时期各地各种国语班之开设，相较于前此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其生源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尤其积极向社会底层招生，显示其社会覆盖面之广；甚至包括华人社会当中的英语群体，其中以“华侨国语学校”最有代表性。实则当时新马华人社会中的英语群体，包括所谓的“土生华人”对于学习国语也有较高的需求，甚至公开呼吁“要求多设国语学校”（南洋商报 1931b）。

新马国语运动“全盛期”如火如荼地开展期间，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仅 1930 这一一年在新加坡就创办了至少三所“国语学校”，分别是：1 月“中华国语学校”、2 月“华侨国语学校”、8 月“中国国语学校”；另有一所 4 月份开始筹划的“星洲国语学校”（叻报 1930e）。其中“中华”、“中国”二校均属柯达文主持而总领事馆支持赞助创办，“华侨国语学校”则是本土华人所操办，主要有林文庆、胡文虎、李光前等人赞助，其首倡人实为校长黄资旦与董事张贞禄。华侨国语学校立足于本土，招生多面向本地华人中的英语社群，尤其是土生华人，受到当时社会的

普遍支持。学生人数由创办时的 80 余人激增至数月后的 400 余人；而累计至 1937 年的八年间学生总数则达 1400 余人，“毕业生七届，计三百余人”（华侨国语学校 1937：17）。

正是由于其招生对象较多为英语群体，因此其自编国语教材也附有英语解释与注音。其广告云：

本校最近编辑《国语新课本》两部，计四册。教材新颖，切于实用，课文附以英语解释并读音，极便侨生及外国人士之采择。（华侨国语学校 1937：37）

其《七周年特刊》一篇学生习作最能体现学校及学生特点，云：（华侨国语学校 1937：23）

我生长于新加坡，以环境关系，自幼即读英文，对于本国文字没有研究，终日与同学都是说英语，受了外国教育的灌输，完全不懂本国语言和文字，不能明白本国历史风俗法律等等。及读到英文毕业以后，因为生活问题到商店学习商法，受东翁之爱护，时时勉励我当于公余之暇，补习本国文字语言为急务，我于是才明白不识本国语言和文字有莫大损失，惭愧之余，我才有决心要补习国语。我到本校虽然受了黄先生尽力教诲，虽然不像从前目不识丁，但实在没有本领能作文章。这回本校要出七周年特刊，先生不以我浅陋，叫我作一篇文章，我才牙牙学语，都晓作法，但试说了几句，以图塞责。自己知道所说的多有不对，深望先生有以敬正，将来学业日进，能识本国文字，说说本国国语，都是本校先生所赐的。还希望侨胞们应当努力研究国语不可被环境所左右。

整体而言，这些国语学校或国语班的学制与教授内容大体差不多，比如中国国语学校的学制分为：普通科一年、补习科半年；专修科四个月；速成科二个月（南洋商报 1930d）。至于教授内容，比如生命堂国语夜学所设课程包括：“国语文选、国语发音学、国语文法、国语会话、国语教学法、注音符号练习法、演讲学、修辞学、辨音学”（南洋商报 1932a）；青年励志社国语夜学的课程则有：“国音字母、平民千字课、平民书信、国语会话”（南洋商报 1932b）；星洲国语学校则是：“国音字母、国语会话、国语文法”（叻报 1930e）。可见最重视的仍是发音、会话，以及识字、作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新马社会开设专门的“国语学校”实则早在 1927 年就已有呼声，甚至于正式发布了“筹备宣言”，其云：

星洲是欧亚通商的口岸，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旅居人士最多。人烟既已稠密，言语当然很复杂的。因此同人们有国语学校的组织，做一种局部国语运动的工作。入学年龄不拘大小，凡有志国语，概在收容编插，以期逐渐普及，而收实效。（南洋商报 1927）

然而这种专门的国语学校最终还是得 1929 年柯达文等人南来以后，配合中国官方国语宣传与推行工作的积极开展，才最终得以实现。由此亦可见 1929 年作为新马国语运动发展阶段分期上的重要标志。

再次就是各地开展的“国语演说比赛”，尤其是华校的国语演说比赛。自 1929 年始，区域性较大型的主要有新加坡青年励志社“华校国语演说竞争会”（南洋商报 1929b）、檳城丽泽社“全檳学生国语竞赛会”（叻报 1930b）、马六甲晨钟励志社“甲属华校学生国语演说竞进会”（南洋商报 1931e），等等。这些都是定期举办，且从当时报道来看几乎是年度盛事，足以牵动当地华社高度关注的。此外又还有各校内的比赛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吉隆坡尊孔学校“国语演说比赛会”（叻报 1929b）、太平公立振华学校“级际国语竞赛”（南洋商报 1934b）、柔佛宽柔学校“学期国语演讲比赛”（南洋商报 1934e）等；甚至于举办国语辩论赛，如 1936 年雪兰莪加影和育华二校举行的“国语辩论竞赛会”（南洋商报 1936b）。而且这时期举凡校庆庆典、毕业典礼、开学典礼、国庆庆典，或者是教师节、儿童节等庆祝会，通常都会同时举办校内国语演说比

赛，并盛重邀请国语专家到场评判，包括在各种活动演讲致词中也时刻不忘“提倡国语”。比如1929年10月的国庆庆典，麻坡化南女校“幼稚园生及初中相继演说，均国音纯正，态度自如”（新国民日报1929），又1933年怡保霹雳女子学校的毕业典礼上特别请来“国语专家”杨宽裕演说，其演说大意即“提倡国语”（南洋商报1933c）。

尤其更应注意到，这时期不仅仅是国语演说比赛频繁，更关键是这些比赛往往能牵动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关心。首先是当时各大报章常对各种比赛的详情进行大篇幅报道，乃至全文刊登演说内容，仔细描绘演说者表现，逐一罗列获奖人名单，包括评判专家的细致讲评，尤其是新加坡青年励志社与马六甲晨钟励志社的两种年度比赛；其次则是社会舆论对于演说比赛的观后感以及各种意见，比如1931年青年励志社第三届国语演说比赛刚落幕，其后接连二天《南洋商报》上都刊有专门社论对比赛进行讨论乃至提出批评，如《国语竞进会昨晚闭幕了》（南洋商报1931c）、《说几句关于华校这次国语演说竞进会的话》（南洋商报1931d），其中前者就尖锐提出“思想太高超、小孩说大人话，代表老师登台开唱留声机”等批评意见。

### 3 结语

上文通过二战以前新马国语运动的宣传与发展，根据运动开展的特征及其整体效果与社会影响，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12-1918年为“萌芽期”；第二阶段1919-1928年为“发展期”；第三阶段1929-1941年为“全盛期”。

整体上应该注意到，中国官方1912年就开始推动新马社会的国语运动，但整体效果并不甚理想，其中原因包括宣传与推行力度不够，管理与执行单位不协调。正如1936年《调查研究》所总结的：（林之光、朱化雨1936：66-67）

自领事兼管华侨教育之规程公布后，而历来政府，对于侨教事业，漠不相关者，至此亦改变其态度，予以相当之注视矣，惟以各地领事，对于教育，既非素稔，欲求其如何促进侨教事业之发展，仍属等于幻想耳。

自民国八年以后，政治屡生纠纷，政府迭经改组，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负责人员之更动，又屡见不鲜，对于国内教育，尚且未能顾及，遑论华侨教育。

而1929年起的国语运动推行能如此集中用力，达到运动的“全盛期”，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及其伴随来的民族主义宣传，形成新马华人社会的一股强大运动力。

尤其是1929年以后达到“全盛期”，不能忽略这时期中国官方的大力宣传与推动，比如上文提及的柯达文作为“中华国语统一运动会海外部主任”，自是官方代表；实则更还要重视的是总领事馆的配合，尤其是这时期担任总领事的唐榴，自1929年颁布通告责令新马“华校采用国语教授”，其后积极配合柯达文成立国语学校、国语统一促进会等，并于柯达文离开新加坡后的1932年12月召集各华校“讨论关于国语统一问题”，因此当时对其评价有云：

唐君于接任视事之后，对于领属应进行之事，莫不极力注意，尤以统一国语，为最重要之事项。（南洋商报1932c）

纵是如此，我们还是得注意到作为新马华人的社会运动，其中仍不难发现操作上的许多细节处与中国官方政策的不尽相符之处。因此，虽然根据上文所述将新马“国语运动”的开展所分的三个阶段，分别均与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形成一定对应性，尤其是1929年达到全盛期的重要原因正是国民军北伐成功后南京政权确立所带动的民族情绪高涨；但整体而言，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些阶段上起着支撑作用的主要仍是社会与文化力量：即“国语运动”作为影响新马华语早期

形成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新马华人社会几乎与中国官方同步于 1912 年就已开展，但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其第一波较大动力则是源自民间文化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响应，而即使第二波“全盛期”的形成与中国官方的政策较为相关，但整体而言仍是民族主义所牵动的民间力量在持续推动其运动的升级。

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引领下持续发展的“国语运动”，经由抗日战争乃至抗战胜利，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社会运动力；终至于 1949 年时人的总结称“国语变为侨校唯一的教学中介”（南洋商报 1949）。

## Bibliography(参考文献)

- Chen Bao Jin(陈宝锦). 1970. 黄羲初先生传(Huang Xichu xiansheng zhuan), 《新山中华商会银禧纪念特刊》(Johor Bahru Chinese Chamber of Trade and Industry 25<sup>th</sup> Anniversary), P99-100. Johor Bahru(新山): 新山中华商会(Johor Bahru Chinese Chamber of Trade and Industry).
- Chen Mong Hock(陈蒙鹤). 1967[2009]. 《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胡兴荣译)(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Guangzhou(广州): 广州科技出版社(Guangzhou Keji Press).
- Cheng Nam Jit Poh(振南日报). 1914a. 养正学校附设半日小学、半夜义学招生广告(Yangzheng xuexiao fushe banri xiaoxue, banye xiaoxue zhaosheng guanggao). Singapore(新加坡): 《振南日报》(Cheng Nam Jit Poh), 2 月 18 日.
- Cheng Nam Jit Poh(振南日报). 1914b. 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开幕演说辞(Nanyang yingshu huaqiao xuewuzonghui kaimu yanshuoci). Singapore(新加坡): 《振南日报》(Cheng Nam Jit Poh), 2 月 25 日.
- Cheng Nam Jit Poh(振南日报). 1914c. 端蒙学校第三次毕业考试题目(Duanmeng xuexiao disanci biye kaoshi timu). Singapore(新加坡): 《振南日报》(Cheng Nam Jit Poh), 8 月 14 日.
- Cheng Nam Jit Poh(振南日报). 1915a. 学务总会意见书(Xuewuzonghui yijianshu). Singapore(新加坡): 《振南日报》(Cheng Nam Jit Poh), 3 月 4 日.
- Cheng Nam Jit Poh(振南日报). 1915b. 南洋英属华侨学务总会倡办国语讲习所简章(Nanyang yingshu huaqiao xuewuzonghui changban Guoyu jiangxisuo jianzhang). Singapore(新加坡): 《振南日报》(Cheng Nam Jit Poh), 3 月 23 日.
- Cheng Nam Jit Poh(振南日报). 1915c. 爱同学校之大改良(Aitong xuexiao zhi dagailiang). Singapore(新加坡): 《振南日报》(Cheng Nam Jit Poh), 9 月 7 日.
- Cheng Nam Jit Poh(振南日报). 1915d. 嚟弄树梔园广告(Linong shuniyuan guanggao). Singapore(新加坡): 《振南日报》(Cheng Nam Jit Poh), 12 月 8 日.
- Dong Ligong(董立功). 2018. 陈嘉庚与道南学堂(Chen Jiageng and Daonan xuetang), 《厦门大学校友总会》(Xiamen university general alumni association), URL(网站): <https://alumni.xmu.edu.cn/info/1020/2045.htm>.
- Fan Pik Shy(潘碧丝). 2007. 马来西亚华语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差异及其协调发展(博士学位论文)(Vari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Malaysian and Putonghua lexicons, PhD dissertation). Beijing(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Huang Qishu(黄麒书). 1935. 《考察南洋华侨教育意见书》(Kaocha nanyang huaqiao jiaoyu yijianshu). Guangzhou(广州): 广东侨务委员会(Guangdong qiaowu weiyuanhui).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12.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Malaysia and Singapore Mandarin lexic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formation), 《中国社会语言学》(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Vol. 17, P63-78.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14. 《叻报》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Le-Bao's lexical feature and its value in lexicology studies), 《语言研究》(Studies in Language) Vol. 4, P93-98.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16. 马新华语词汇研究史上的第一部特有词语词典——许云樵《南洋华语俚俗辞典》评议 (The first unique lexicon dictionary in the history of Malaysian-Singaporean Mandarin lexical study - a critical review of Xu Yunqiao's Nanyang huayu lisu cidan), 《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70, P97-122.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17. 马来西亚华语研究的设想与实践(On the prospect and research of Malaysian Mandarin study),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Vol.10 No.3, P149-153.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19a.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之倡办与创校始末(未刊)(The proposal and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Vol.8.
- Khoo Kiak Uei(邱克威). 2019b. 关于徐志摩给新加坡道南学校的二幅题签(未刊)(Xu Zhimo's two calligraphy written for Singapore Tao Nan School), 《马大华人文学与文化学刊》(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7 No.2.
- Lat Pau(叻报). 1907a. 招报学生(Zhaosheng guanggao).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2月30日.
- Lat Pau(叻报). 1907b. 访聘教员(Fangpin jiaoyuan).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2月30日.
- Lat Pau(叻报). 1912. 爱同学校招生夜习国语广告(Aitong xuexiao zhaosheng yexi Guoyu guanggao).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2月27日.
- Lat Pau(叻报). 1928. 徐志摩游欧过叻(Xu Zhimo you ou guo le).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1月5日.
- Lat Pau(叻报). 1929a. 编者第一次的献词(Bianzhe diyici de xianci).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6月17日.
- Lat Pau(叻报). 1929b. 尊孔国语演说比赛会(Zunkong Guoyu yanshuo bisaihui).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6月21日.
- Lat Pau(叻报). 1929c. 关于华校采用国语教授之领馆来件(Guanyu huaxiao caiyong Guoyu jiaoshou zhi lingguan laijian).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9月29日.
- Lat Pau(叻报). 1929d. 中华国语统一运动会海外部主任柯达文先生昨日到星(Zhonghua Guoyu tongyi yundonghui haiwaibu zhuren Ke Dawen xiansheng zuori dao le).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0月15日.
- Lat Pau(叻报). 1929e. 星嘉坡福建会馆执行委员会聘请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女学三校校长教员启事(Xinjiapo fujian huiguan zhixingweiyuanhui pinqing Daonan xuexiao, Aitong xuexiao, Chongfu xuexiao sanxiao xiaozhang jiaoyuan qishi).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2月20日.
- Lat Pau(叻报). 1930a. 聘请教员(Pinqing jiaoyuan).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月6日.
- Lat Pau(叻报). 1930b. 全槟学生国语竞赛会开幕(Quanbin xuesheng Guoyu jingsaihui kaimu).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月16日.
- Lat Pau(叻报). 1930c. 中华国语学校定期举行开幕(Zhonghua Guoyu xuexiao dingqi juxing kaimu).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2月13日.
- Lat Pau(叻报). 1930d. 国语统一促进会筹备处通告本坡各学校(Guoyu tongyi cujinhui choubeichu tonggao benpo ge xuexiao).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4月19日.
- Lat Pau(叻报). 1930e. 组织星洲国语学校的话(Zuzhi Xingzhou Guoyu xuexiao de hua).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4月19日.
- Lat Pau(叻报). 1930f. 聘请教员(Pinqing jiaoyuan).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6月24日.
- Lat Pau(叻报). 1931. 聘请教员(Pinqing jiaoyuan). Singapore(新加坡): 《叻报》(Lat Pau), 11月20日.
- Li Jinxi(黎锦熙). 1921. 国语运动之过去与将来(Guoyu yundong zhi guoqu yu jianglai), 朱麟公《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Guoyu wenti taolunji, book6), P38-44, Shanghai(上海): 中国书局(Zhongguo Shuju).
- Li Jinxi(黎锦熙). 1935[2011]. 《国语运动史纲》(Guoyu yundong shigang). Beijing(北京): 商务印书馆(Commercial Press).

- Lin Zhiguang, Zhu Huayu(林之光、朱化雨). 1936. 《南洋华侨教育调查研究》(Nanyang huaqiao jiaoyu diaocha yanjiu). Guangzhou(广州): 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 Lu Hu(鲁虎). 2014. 《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Exploring the Perceptions of China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49-1965). Singapore(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Global Publishing).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23. 国语夜学之成绩(Guoyu yexue zhi chengj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0月2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27. 国语学校筹备宣言照录(Guoyu xuexiao choubei xuanyan zhaolu).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1月4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28. 国语罗马字传习所开课(Guoyu Luomazi chuanxisuo kaike).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9月1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29a. 国语专家到叻开始工作(Guoyu zhuanjia dao le kaishi gongzu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月16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29b. 青年励志社举行国语演说竞争会(Qingnian lizhishe juxing Guoyu yanshuo jingzhenghu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4月30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29c. 国语夜学成立佳音(Guoyu yexue chengli jiayi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6月25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0a. 将有国语专科夜学出现(Jiangyou Guoyu zhuanke yexue chuxi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月15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0b. 星福建会馆第一次联欢会盛况(Xing fujian huiguan diyici lianhuanhui shengkuang).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月20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0c. 新加坡中华国语统一促进会筹备会为宣传周事请总领事发通告(Xinjiapo zhonghua Guoyu tongyi cujinhui choubeihui wei xuanchuanzhou shiqing qing zonglingshi fa tongg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4月9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0d. 本坡将有中国国语学校诞生消息(Benpo jiangyou Zhongguo Guoyu xuexiao dansheng xiaox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3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0e. 国语运动声中之培道学校(Guoyu yundong sheng zhong zhi Peidao xuexi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3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0f. 公立侨星平民学校消息(Gongli Qiaoxing pingmin xuexiao xiaox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26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1a. 国语运动消沉了(Guoyu yundong xiaochen le).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4月24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1b. 仅识英语之土生华侨要求多设国语学校(Jinshi yingyu zhi tusheng huaqiao yaoqiu duoshe Guoyu xuexiao).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4月24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1c. 国语竞进会昨晚闭幕了(Guoyu jingjinhui zuowan bimu le).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25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1d. 说几句关于华校这次国语演说竞进会的话(Shuo jiju guanyu huaxiao zheci Guoyu yanshuo jingjinhui de hua).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5月26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1e. 马六甲华校举行国语竞赛会(Maliujia huaxiao juxing Guoyu jingsaihui).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9月30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2a. 生命堂国语学校添办新班(Shengmingtang Guoyu xuexiao tianban xinb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2月22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2b. 青年励志社在爱同附设之国语夜学组继续开办新班(Qingnian lizhishe zai Aitong fushe zhi Guoyu yexuezu jixu kaiban xinban). Singapore(新加坡): 《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9月30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2c. 我国驻星总领事本日召集侨团学校讨论国语统一问题(Woguo zhu Xing zonglingshi benri zhaoji qiaotuan xuexiao taolun Guoyu tongyi went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15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3a. 槟华国语运动筹备会第一次筹备会议纪实(Binhua Guoyu yundong choubuihui diyici choubui huiyi jish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8月5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3b. 现已报名参加雪运会之球队及健儿(Xianyi booming canjia Xueyunhui zhi qiudui ji jianer).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0月26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3c. 霹雳女子中小学校举行新校舍开幕典礼(Pili nvzi zhongxiaoxuexiao juxing xinxiaoshe kaimu dianl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21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4a. 吉隆坡国语运动声中精武国语班举行毕业典礼(Jilongpo Guoyu yundong sheng zhong Jingwu Guoyuban juxing biye dianl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月24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4b. 公立振华学校举行第二次级际国语竞赛(Gongli Zhenhua xuexiao juxing dierci jiji Guoyu jingsa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4月1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4c. 马六甲晨钟励志社义务夜校将举行毕业考试(Maliujia Chenzhong lizhishe yiwu yexiao jiang juxing biye kaosh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6月9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4d. 彭亨文德甲中华学校开办国语夜学班(Pengheng Wendejia Zhonghua xuexiao kaiban Guoyu yexueban). 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7月23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4e. 柔佛宽柔男女学校举行学期演讲比赛(Roufo Kuanrou nannv xuexiao juxing xueqi yanjiang bisa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2月5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5. 福建省馆主持之三校会考昨日举行完竣(Fujian huiguan zhuchi zhi sanxiao huikao zuori juxing wanjun).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6月16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6a. 国语夜学院请陈国光讲运动的利益(Guoyu yexueyuan qing Chen Guoguang jiang yundong de liy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3月16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36b. 加影育华举行国语辩论竞赛会(Jiaying Yuhua juxing Guoyu bianlun jingsaihui).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0月27日.
- Nanyang Siang Pau(南洋商报). 1949. 由史的透视看马华教育(You shi de toushi kan mahua jiaoyu). Singapore(新加坡):《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10月16日.
- Penang Sin Poe(槟城新报). 1914. 领事通告(Lingshi tonggao). Penang(槟城): Penang Sin Poe(《槟城新报》), 1月8日.
- Ser Wue Hiong(徐威雄). 2013.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A historical observation of Malaysia-Singapore Mandarin: from 19th century to 1919),《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15, P85-124.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19a. 邦咯鼎新国语讲习所之告成(Bangge Dingxin Guoyu jiangxisuo zhi gaocheng). Singapore(新加坡):《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10月1日.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19b. 例言(Liyan). Singapore(新加坡):《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10月1日.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19c. 例言(四续)(Liyan four). Singapore(新加坡):《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10月6日.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20. 聘请教员(Pinqing jiaoyuan). Singapore(新加坡):《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3月23日.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21. 马六甲夜学注重国语(Maliujia yexue zhuzhong Guoyu). Singapore(新加坡):《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4月23日.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25. 麻坡教育之真相(Mapo jiaoyu zhi zhenxiang). Singapore(新加坡):《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10月23日.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29. 化南女校之新气象(Huanan nvxiao zhi xinqixiang). Singapore(新加坡): 《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10月19日.
- Sin Kuo Min(新国民日报). 1933. 华星(第四期)(Huaxing, volume four). Singapore(新加坡): 《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 5月9日.
- Singapore Chinese Mandarin school(华侨国语学校). 1937. 《新加坡华侨国语学校第七周年纪念特刊》(The Singapore Chinese Mandarin school seventh anniversary special magazine). Singapore(新加坡): 华侨国语学校(Singapore Chinese Mandarin school).
- Tai Xuan(太玄). 1921. 国语科发音的处理(Guoyuke fayin de chuli), 朱麟公《国语问题讨论集(第五编)》(Guoyu wenti taolunji, book6), P22-26. Shanghai(上海): 中国书局(Zhongguo shuju).
- Tay Cheong Hiang(郑昭贤). 2012. 《中化历史长河》(A journey down the river of history). Muar(麻坡): 麻坡中化中学(Chung Hwa High School).
- Wang Zhun Chun(王振春). 1990. 道南带头收各籍学生(Daonan daitou shou geji xuesheng), 《根的系列(二)》(Gen de xilie 2), P108-116. Singapore(新加坡): 胜友书局(Seng Yew Bookstore).
- Xu Yi(徐祎). 2017. 马来西亚华语的历时考察(Malaixiya huayu de lishi kaicha),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2, P558-566.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 Yeo Song Nian(杨松年). 2001. 《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Zhanqian Xinma wenxue bentu yishi de xingcheng yu fazhan). Singapore(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Zhang Renfeng(张人凤). 2014. 追溯南洋华文教科书(Zhuisu Nanyang huawen jiaokeshu),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编《开卷有益, 润物无声: 东南亚早期华文课本图示目录》(Kaijuan youyi runwu wusheng: Dongnanya zaoqi huawen keben tushi mulu). Singapore(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Zhu Lingong(朱麟公). 1921. 《国语问题讨论集(第七编)》(Guoyu wenti taolunji, book7). Shanghai(上海): 中国书局(Zhongguo shuju).